

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

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

上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0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ISBN 978 - 7 - 5325 - 5500 - 0

I. 清… II. 中… III. 军机处 - 档案资料 - 汇编 - 中国 - 清代 - 满语 IV. K249.0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 226481 号

责任编辑：余鸣鸿

装帧设计：黄琛

张云

技术编辑：顾友杰

ISBN 978-7-5325-5500-0



9 787532 555000 >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l@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金坛市古籍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20.5 插页 10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

ISBN 978 - 7 - 5325 - 5500 - 0

K · 1259 精装定价：980.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于 沛 朱诚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陈 桦 邹爱莲 孟 超

徐兆仁 戴 逸

《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编译人员

郭美兰

总序

戴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国家批准建议纂修清史之报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组成之领导小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编纂工程于焉肇始。

清史之编纂酝酿已久，清亡以后，北洋政府曾聘专家编写《清史稿》，历时十四年成书。识者议其评判不公，记载多误，难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乱不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领导亦多次推动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辍。新世纪之始，国家安定，经济发展，建设成绩辉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进步，学界又倡修史之议，国家采纳众见，决定启动此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

清代为我国最后之封建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远。清代众多之历史和社会问题与今日息息相关。欲知今日中国国情，必当追溯清代之历史，故而编纂一部详细、可信、公允之清代历史实属切要之举。

编史要务，首在采集史料，广搜确证，以为依据。必藉此史料，乃能窥见历史陈迹。故史料为历史研究之基础，研究者必须积累大量史料，勤于梳理，善于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科学之抽象，上升为理性之认识，才能洞察过去，认识历史规律。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犹如水之于鱼，空气之于鸟，水涸则鱼逝，气盈则鸟飞。历史科学之辉煌殿堂必须岿然耸立于丰富、确凿、可靠之史料基础上，不能构建于虚无飘渺之中。吾侪于编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献丛刊》、《档案丛刊》，二者广收各种史料，均为清史编纂工程之重要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质量；二为抢救、保护、开发清代之文化资源，继承和弘扬历史文化遗产。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多、乱、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国素称诗书礼义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栋，尤以清代为盛。盖清代统治较久，文化发达，学士才人，比肩相望，传世之经籍史乘、诸子百家、文字声韵、目录金石、书画艺术、诗文小说，远轶前朝，积贮文献之多，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昔梁元帝聚书十四万卷于江陵，西魏军攻掠，悉燔于火，人谓丧失天下典籍之半数，是五世纪时中国书籍总数尚不甚多。宋代印刷术推广，载籍日众，至清代而浩如烟海，难窥其涯涘矣。《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清代书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种，人议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增补书一万零四百三十八种，超过原志著录之数。彭国栋亦重修《清史稿艺文志》，著录书一万八千零五十九种。近年王绍曾更求详备，致力十余年，遍览群籍，手抄目验，成《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增补书至五万四千八百八十种，超过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书之全豹。王绍曾先生言：“余等未见书目尚多，即已见之目，因工作粗疏，未尽钩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书籍总数若干，至今尚未能确知。

清代不仅书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档案留存于世。中国历朝历代档案已丧失殆尽（除近代考古发掘所得甲骨、简牍外），而清朝中枢机关（内阁、军机处）档案，秘藏内廷，尚称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档案，多达二千万件。档案为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于当事人亲身经历和直接记录，具有较高之真实性、可靠性。大量档案之留存极大地改善了研究条件，俾历史学家得以运用第一手资料追踪往事，了解历史真相。

二曰乱。清代以前之典籍，经历代学者整理、研究，对其数量、类别、版本、流传、收藏、真伪及价值已有大致了解。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大规模清理、甄别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销毁所谓“悖逆”、“违碍”书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时经师大儒，联袂入馆，勤力校理，尽瘁编务。政府亦投入巨资以修明文治，故所获成果甚丰。对收录之三千多种书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种存目书撰写详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内容要旨，述其体例篇章，

论其学术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编成二百卷《四库全书总目》，洵为读书之典要、后学之津梁。乾隆以后，至于清末，文字之狱渐戢，印刷之术益精，故而人竞著述，家娴诗文，各握灵蛇之珠，众怀昆冈之璧，千舸齐发，万木争荣，学风大盛，典籍之积累远迈从前。惟晚清以来，外强侵袭，干戈四起，国家多难，人民离散，未能投入力量对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档案，深藏中秘，更无由一见。故不仅不知存世清代文献档案之总数，即书籍分类如何变通、版本庋藏应否标明，加以部居舛误，界划难清，亥豕鲁鱼，订正未遑。大量稿本、抄本、孤本、珍本，土埋尘封，行将渐灭。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与坊间劣本混淆杂陈。我国自有典籍以来，其繁杂混乱未有甚于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献、档案，非常分散，分别庋藏于中央与地方各个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教学研究机构与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级之档案言，除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一千万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档案在战争时期流离播迁，现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此外，尚有藏于沈阳辽宁省档案馆之圣训、玉牒、满文老档、黑图档等，藏于大连市档案馆之内务府档案，藏于江苏泰州市博物馆之题本、奏折、录副奏折。至于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档案文书，损毁极大，但尚有劫后残余，璞玉浑金，含章蕴秀，数量颇丰，价值亦高。如河北获鹿县档案、吉林省边务档案、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河南巡抚藩司衙门档案、湖南安化县永历帝与吴三桂档案、四川巴县与南部县档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鱼鳞册、徽州契约文书、内蒙古各盟旗蒙文档案、广东粤海关档案、云南省彝文傣文档案、西藏噶厦政府藏文档案等等分别藏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甚至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档案（亦称《叶名琛档案》），英法联军时遭抢掠西运，今藏于英国伦敦。

清代流传下之稿本、抄本，数量丰富，因其从未刻印，弥足珍贵，如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盛宣怀、张謇、赵凤昌之家藏资料。至于清代之诗文集、尺牋、家谱、日记、笔记、方志、碑刻等品类繁多，数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天津、武汉及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不少贮存。丰城之剑气腾霄，

合浦之珠光射日，寻访必有所获。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苏州、常熟两地图书馆、博物馆中，得见所存稿本、抄本之目录，即有数百种之多。

某些书籍，在中国大陆已甚稀少，在海外反能见到，如太平天国之文书。当年在太平军区域内，为通行之书籍，太平天国失败后，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毁，现在已难见到，而在海外，由于各国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竞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世界各地图书馆中保存之太平天国文书较多。二十世纪，向达、萧一山、王重民、王庆成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寻觅太平天国文献，收获甚丰。

四曰新。清代为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之过渡阶段，处于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之中，产生一大批内容新颖、形式多样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携来自然科学、艺术和西方宗教知识。乾隆时编《四库全书》，曾收录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乾坤体仪》，熊三拔《泰西水法》、《简平仪说》等书。迄至晚清，中国力图自强，学习西方，翻译各类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声光化电之书，后严复所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纾所译《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文艺小说。中学西学，摩荡激励，旧学新学，斗妍争胜，知识剧增，推陈出新，晚清典籍多别开生面、石破天惊之论，数千年来所未见，饱学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国传统之知识框架，书籍之内容、形式，超经史子集之范围，越子曰诗云之牢笼，发生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化，出现众多新类目、新体例、新内容。

清朝实现国家之大统一，组成中国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现以满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傣文、彝文书写之文书，构成为清代文献之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献、档案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加绚丽多彩。

清代之文献、档案为我国珍贵之历史文化遗产，其数量之庞大、品类之多样、涵盖之宽广、内容之丰富在全世界之文献、档案宝库中实属罕见。正因其具有多、乱、散、新之特点，故必须投入巨大之人力、财力进行搜集、整理、出版。吾侪因编纂清史之需，贾其余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装网络，设数据库，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贮存、检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

典籍浩瀚，吾侪汲深绠短，蚁衔蚊负，力薄难任，望洋兴叹，未能做更大规模之工作。观历代文献档案，频遭浩劫，水火兵虫，纷至沓来，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为浩叹。切望后来之政府学人重视保护文献档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续努力，再接再厉，使卷帙长存，瑰宝永驻，中华民族数千年之文献档案得以流传永远，沾溉将来，是所愿也。

前 言

熬茶，是指在藏传佛教寺庙发放布施。清代熬茶，通常由熬茶者向众喇嘛发放银两等，众喇嘛则为之唸经祈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是汇抄乾隆五年（1740）至乾隆十三年（1748）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及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经奏请乾隆帝，获准派使赴藏熬茶过程中形成的各类往来文书而成的专档，其内容反映了清廷对待准噶尔蒙古派使赴藏熬茶一事所持态度，以及安排熬茶的全部过程等。开发利用《熬茶档》，无疑对推进准噶尔蒙古及西北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历史研究有所帮助。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有明清两朝历史档案1000余万件（册），其中明朝档案只有3000余件（册），绝大部分为清朝档案。清朝档案的五分之一即200余万件（册）为满文档案，按机构分为内阁、宫中、军机处、内务府等，这些满文档案，其内容多涉及清代边疆和民族问题，除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月折档、上谕档、议复档，内阁起居注、满文老档、国史档，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档案，珲春副都统衙门档案等内容宽泛的档案中都有不少有关边疆和民族问题的史料外，有清一代，就边疆和民族问题，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事件、不同问题形成的满文专档也为数不少，像《西藏档》、《廓尔喀档》、《班禅事件档》、《年班档》、《木兰档》等等，仅仅反映准噶尔问题的专档就有《准噶尔档》、《北路军务档》、《军务档》、《熬茶档》、《夷使档》和《西路档》，总的起止时间为雍正九年（1731）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均系抄录有关上谕、寄信、议复、奏折等文件汇集而成，其中，雍正朝《准噶尔档》和《北路军务档》、《军务档》，主要反映了清政府派兵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阿睦尔撒纳的历史事件。《熬茶档》、《夷

使档》、《西路档》和乾隆朝《准噶尔档》，反映了准噶尔部向清朝中央政权表示和好，遣使纳贡，派人到西藏熬茶，以及清朝中央政府为此派官兵接应护送，宴请赏赐准噶尔部上层人物、使臣等情况。

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是军机处汇抄办理准噶尔蒙古赴藏熬茶事宜过程中移行往来文书而成的簿册，也是有关准噶尔问题的专档之一。由于准噶尔蒙古派使赴藏熬茶一事涉及边疆和民族，其派往办理防务、接应及护送等事务的官员又系满蒙官员，因而所形成的档案全部用满文写成。文书种类包括皇帝颁发的谕旨，办事大臣呈递的奏折及其相互间所行咨文，办事大臣译递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等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西藏各大寺庙住持的信函，及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西藏各大寺庙住持等回复噶尔丹策零等人的信函，准噶尔熬茶使在藏各大寺庙熬茶布施所用银两及噶尔丹策零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互赠礼品清单等。如果单从文书种类上分析，《熬茶档》包含的文种有些是十分罕见和独特的，像准噶尔首领与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间的往来书信，尤其是准噶尔首领与西藏各大寺庙住持间的往来书信，在清代档案中是很少见的，因此这部分档案弥足珍贵。

存留至今的《熬茶档》仅有7册，黄色封面，写有档案名称及其起止时间，毛装。其中4册大开本，横29厘米，纵40厘米，厚度约4厘米左右；另有3册小开本，横26厘米，纵30厘米，厚度约1厘米左右。小开本的3册与大开本4册中的第四册内容相同，因此内容不重复的只有4册。《熬茶档》的起止时间为乾隆五年（1740）五月至乾隆十三年（1748）四月，共有正件201件，附件31件，译成汉文约计20万字。《熬茶档》全部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而其他保存有清代档案的如西藏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处则不见有此项档案。《熬茶档》形成至今已有260余年，历经沧桑，破损较为严重，纸张也非常酥脆，所幸文字部分尚较完整，如果加以修复，无碍于利用。以往由于文字的关系，《熬茶档》基本未被学界利用过，翻阅近些年出版的有关西部蒙古研究著作《卫拉特蒙古简史》、《卫拉特蒙古史纲》、《和硕特蒙古史》、《土尔扈特部落史》等，

还鲜见有学者利用此项档案进行研究。

《熬茶档》记录了乾隆五年到乾隆十三年间，准噶尔部三次派使熬茶的全部经过。第一次在乾隆五年到乾隆六年（1741），第二次在乾隆八年（1743）到乾隆九年（1744），第三次在乾隆十二年（1747）到乾隆十三年（1748）。准噶尔熬茶使在三次熬茶过程中，第一次是半道至西宁返回，只有后两次深入西藏腹地，完成了所担负的熬茶使命。《熬茶档》所反映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获准熬茶，共为三次。准噶尔部首领三次以不同理由向清帝奏请准许派使赴藏熬茶：第一次是噶尔丹策零以五世班禅额尔德尼圆寂需作佛事为由，向乾隆帝奏请准许遣使入藏，以便向已故班禅额尔德尼进献布施；第二次是噶尔丹策零以其父策妄阿喇布坦亡故，奏请派使赴藏为其父作法事；第三次是准噶尔部新袭首领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以其父噶尔丹策零亡故，奏请派使赴藏为其父作法事。准噶尔部首领的三次请求，在清政府看来，虽属过分，且操作起来颇为费事，但经乾隆帝权衡利弊，斟酌再三，还是颁旨同意了其请求。在《熬茶档》中，只是提到准噶尔部首领曾向乾隆帝奏请遣使赴藏熬茶，具体过程不见记载，据查其详细过程纪录在军机处满文《夷使档》中。

（二）拓展边卡，加强防务。准噶尔蒙古派使赴藏熬茶，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简单来讲，清入主中原之后，远在西域的准噶尔部起初与清政府基本保持和平交往，随着噶尔丹势力的增强，准噶尔与清政府之间的关系曾一度转为以战为主的关系。噶尔丹兵败之后，准噶尔汗国陷入困境；而发展到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准噶尔汗国转而日益强盛，与清政府保持时战时和的状态。雍正十一年（1733），准噶尔部兵败额尔德尼召之后，开始连年遣使进京，请求开放肃州等地的贸易。乾隆帝是在双方关系缓和的情况下，才准许准噶尔部派使赴藏熬茶的。另外，准噶尔蒙古进藏，对清政府来说，始终是个敏感问题，因为准噶尔蒙古策妄阿喇布坦当政时期，为了控制拉萨以号令众蒙古，曾经派兵侵扰西藏，占领拉萨，直到三年后才被清军赶出西藏，因此，无论是清政府

还是西藏当地的僧俗显贵，都对准噶尔人进藏持有戒心。

正是基于这两点，乾隆帝尽管同意准噶尔部派使进藏熬茶，但在防务上却要周密部署。一是拓展青海境内的卡伦并清道，即将原设卡伦外移至便于瞭望并联络之地，而准噶尔来使路经驻牧之青海蒙古，须先妥加迁移，不得与熬茶使等见面，以防私下贸易。如在准噶尔第二次遣派熬茶使时，将原西宁至依克柴达木、得卜特尔所设十三处卡伦，往远处拓展至哈济尔。皂哈班哈柴达木等卡伦，原先只有蒙古兵，而此时则加派西宁总兵所属绿营兵一百名，增补驻守卡伦。二是在青藏交界地方驻扎重兵，以防不测。防守阿哈雅克、腾格里淖尔路，喀喇乌苏、达木、羊八井、纳克桑等地，要派兵六千名，由扎萨克头等台吉珠密那木扎勒率带驻守；防守如托克、努热路，由公珠尔默特车布登率兵五千名驻守阿里克地方，阿里克地方倘有不虞，则要抽调喀喇乌苏六千名兵丁前往增援，且将藏、工布、达克布所备四千名兵丁调往喀喇乌苏，以作应援。喀喇乌苏等处驻兵若有不虞，则由阿里克五千兵丁内抽调两千名，藏、工布、达克布所备四千名兵丁作为应援，以期牢固。

（三）委派官员，分工负责。准噶尔部首领奏请派使赴藏熬茶，乾隆帝准许派300人赴藏，人数虽不为多，但由于各种历史渊源，清政府对此事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乾隆帝专门由京派理藩院侍郎玉保远赴青海，料理拓展卡伦、与来使沟通联络、接济粮草牲畜、招商贸易等事务；委派凉州将军乌赫图专门负责伴送准噶尔熬茶使，担负防卫之责，凡贸易、熬茶、行路、住宿，始终影随来使；谕令驻藏大臣纪山、索拜等作好西藏境内的防务，尤其是熬茶使在藏期间的住宿、出行、熬茶、粮草供给等等。从档案反映的情况看，郡王颇罗鼐在筹办防务和粮草的问题上是很积极的，在与熬茶使谈话或交涉过程中也完全遵行乾隆帝的旨意，表明当时清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统治已很稳固，西藏地方政权对中央政府也是绝对服从的。

（四）筹措牲畜，接济粮草。我们知道，当时准噶尔的中心地域伊犁地区离西藏路途遥远，外加熬茶使还要携带大量货物，因此准噶尔人乘骑的骆驼、

马匹等是很难顺利到达西藏的，但凡行抵青海，牲畜之疲瘦就很明显。因此在准备迎接准噶尔第二次派熬茶使时，虽于东科尔地方备有马驼，然考虑东科尔距卡伦有两千余里，立即赶往，不便替用，故由东科尔所备马驼中抽出马800匹、驼400峰，在侍郎玉保及西宁绿营兵前往卡伦时即行赶往，在卡伦附近精心牧放。倘若使臣等从卡伦即行进藏，即由将军乌赫图、侍郎玉保查明使臣等骑来马驼，酌情给换。此外，在喀喇乌苏、拉萨等地都备有马畜、粮草，以备接济。

（五）招商贸易，伴送熬茶。准噶尔来使赴藏熬茶，需要先将货物在青海东科尔等地出售变现，然后再带着银两赴藏熬茶。从熬茶使进献各寺庙的布施看，除少量礼物外，份额较重的还是黄金和银两，而这些金银基本都是在青海地方出售所带皮张等物获取的，因此，贸易就成为熬茶使赴藏途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从准噶尔部角度讲，是很看重此项贸易的。单从数量上看，准噶尔人带来的货物是比较多的，熬茶使第三次来时，声称所带货物价值银30万两，贸易进行到一段时间，售出的皮张即有“灰鼠皮一万六千八百四十张、狼皮五千六百九十六张、羊羔皮八万九千三百五十二张”（乾隆十二年十月玉保折），可见贸易量之大。为了收购准噶尔人所带货物，东科尔等地的官员广招商贾，与准噶尔人进行交易，东科尔城一时商贾云集，生意兴隆，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准噶尔来使前往西宁附近塔尔寺等寺庙，西藏拉萨三大寺、甘丹寺、后藏扎什伦布等寺庙熬茶，负责伴送的将军乌赫图都派官兵随行，既要保证来使安全，又要防止来使另有企图，探取青藏地区情报，或私下与蒙藏人众交流，同时要获取准噶尔来使熬茶过程中的各种细节，然后奏报皇帝，像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各大寺庙住持的信件内容，熬茶使布施银两数目，都要一一记录。可以说，准噶尔熬茶使的一举一动，都在清政府的严密监视和掌控之中。

（六）结算经费，嘉奖抚恤。准噶尔人入藏熬茶，清政府需要遣派官兵伴送、拓展卡伦防守、备办牲畜粮草接济，所有这些，无一例外都要耗费银两，因此在每次熬茶之后，有关官员都要奏销所用过的钱粮。另外，在办理准噶尔

熬茶事务的过程中，诸如郡王颇罗鼐、那克树三十九族番众等，奋力备办牲畜、粮草，因此在事后也要降旨豁免钱粮或鼓励，台站出力官兵则要给予物质上的奖励。此外，由于勘查行进路线，尤其是勘查水草，头侍卫达赖未及进藏，便在青海病故；护军参领马进泰由藏返回时，也因高原反应，患肺气肿亡故。乾隆帝不仅谕令将他们的尸骨运回京城，而且赏银抚恤。可见准噶尔熬茶之事，备受乾隆帝重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作为清廷安排准噶尔熬茶使赴藏熬茶过程中所形成公文的汇抄本，从内容上分析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丰富多样，不仅反映清政府对熬茶的操纵过程和掌控程度，而且也反映蒙藏民族彼此间的认识和关系，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与噶尔丹策零等人之间往来信件的内容，恐怕很难在其他史料中见到；二是系统全面，《熬茶档》是一种专档，汇抄了准噶尔派人到京请求派使赴藏熬茶，得到清廷允准，清廷专派官员远迎，一路护送贸易、熬茶过程中形成的各类公文文书，因而能够反映整个事件的全过程，是任何一种单一文种档案所无法比拟的；三是未曾公布过，《熬茶档》是久藏宫闱、向未公之于世的一项档案，其内容偶见于宫中《满文朱批奏折》，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满文上谕档》等，但由于这些档案也未曾公布，且文字为满文这一特殊性，史学界几乎无人利用过这部分档案。汉文史料诸如清代官修史书《高宗实录》、《平定准噶尔方略》等，对准噶尔赴藏熬茶事宜虽有涉及，但篇幅相对《熬茶档》要简短得多，内容自然无法与《熬茶档》相提并论，所反映史实的系统性、细密程度也是无法比拟的。也许正是史料的匮乏，史学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尚不深入，专门研究的论著至今不多见。

《熬茶档》作为记录清代准噶尔蒙古派使赴藏熬茶事件的原始档案，所承载的资讯是十分丰富的，夸张点讲，仅就准噶尔蒙古派使赴藏熬茶事件的过程，我们几乎可以拿档案内容还原在清廷视角中折射的历史原貌。因此仔细分析这一珍贵历史档案透露给我们的信息，对研究乾隆初期准噶尔史乃至西北、西

南民族、边疆、经济、文化、宗教，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讲：

一是可以拓宽准噶尔史的研究领域。以往的准噶尔史研究，更注重准噶尔与清廷、准噶尔与喀尔喀、准噶尔与西藏的军事冲突，而对准噶尔的经济发展、宗教文化、与其他民族的交往，尤其是对准噶尔与清廷保持和平交往时期的研究就略显不足。《熬茶档》反映了清廷为了羁縻“外藩”，笼络准噶尔上层贵族，保证西北边陲的安宁，允许准噶尔派使赴藏熬茶，携带货物贸易，并为此提供一切便利条件；而从准噶尔方面来讲，赴藏熬茶，对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人民来说是一项经常性的、重要的宗教活动，双方关系的缓和为赴藏熬茶提供了前提条件。此外，康熙、雍正年间以来时战时和，准噶尔地区经济受到重创，需要与内地进行交流贸易，以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乾隆初年准噶尔蒙古在青海的三次贸易、西藏的两次熬茶，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因此我们说，准噶尔部派使赴藏熬茶事件所折射出的当时的社会背景、社会发展状况、经济发展状态、民族交往关系、宗教文化、军事部署、交通台站、货物贸易、自然环境等方面的资讯，均可帮助我们拓宽研究领域。

二是可以细化准噶尔史的研究。《熬茶档》不仅反映了准噶尔部派使赴藏熬茶事件的全过程，而且具体到每个环节，所反映的内容也很细致入微，从驻哈密员外郎噶木布等呈报准噶尔熬茶使抵达哈密，侍郎玉保、将军乌赫图等接应伴送，安排贸易熬茶，办理牲畜粮草，涉及内容极为繁杂。在三次迎来送往的过程中，清廷所派官员与准噶尔来使间的谈话，既反映了各自的要求和观点，也表现了相互间的谈话艺术，读来别有情趣。特别是记录准噶尔部首领与西藏宗教人士间的书信往来，以及准噶尔熬茶使在青海、西藏各大寺庙熬茶布施银两物品的具体数目，是非常难得的。通过档案分析，即使在当时，这些内容也是很难得到的，清廷在不为准噶尔人知觉的情况下，秘密与各大寺庙住持联系，极为隐秘地采集情报。同样，准噶尔熬茶使也担负探取情报的使命，因而才有准噶尔熬茶使借出痘不让伴送人等一同进入寺庙等方面的记录。纵观《熬茶档》内容，在和平交往这一大的主题下，清廷与准噶尔间的相互戒备防范是无处不